

民国学界对美国社会学理论的选择与融会： 对民国时期社会学中国化一个侧面的考察^①

阎书钦

内容摘要 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社会学中国化思潮，虽以构建中国自身社会学理论体系及研究中国社会为落脚点，但引介欧美社会学理论为其基础。由于师承等诸多机缘，民国学界主要遵奉美国社会学范式。20年代至30年代初以引介美国现成理论体系为主；自20年代末开始，诸留美归国学者始融会美国新兴社会学理论，构建自身社会学理论体系。20世纪初亦为美国社会学重要转型期，早期心理社会学日衰，社会行为分析理论、文化社会学、现代农村与都市社区研究等新兴社会学研究范式日兴。民国学界对美国新兴社会学理论多取融会贯通之意，并力图有所创新。

关键词 民国时期 社会学中国化 美国范式

洎乎20世纪30年代，民国学界社会学中国化呼声日高。所谓社会学中国化，即首先通过选择、融会西方各家理论而创立自身理论体系，之后将此种理论应用于中国社会研究。故选择与融会西方社会学理论为社会学中国化之基础。如果细察民国各类社会学论说，可谓渊源有自，多基于西说。不过，中国学界所临西说又极繁复。因为社会学自19世纪诞生后，无论研究对象，抑或研究方法，均呈游移，欧美论者认知往往异大于同，进而形成各色流派。孔德(A Comte)在《实证哲学教程》(*Cours de Philosophie Positive*, 6 Volumes, 1830—1842)中仅描述社会学大致轮廓，而斯宾塞(H Spencer)社会有机体论又为多数论者否定。之后，各种学派在欧美至为纷杂。尤其在美国，20世纪初形成与欧洲哲理式研究迥乎不同的颇具实证色彩的社会学研究范式，社会行为分析、文化社会学以及社会行为分析与地理区位相结合的人文区位学日渐兴盛，哲理式的早期心理社会学则日趋式微。由于师承等诸多机缘，民国学界自20世纪20年代起主要遵奉美国理论^②。问题在

^①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金资助，项目批准号：09YJA770049。

^② 民国社会学者以留美出身者为最多。1948年5月，孙本文在《当代中国社会学》中列举1947年12月前在中国各大学任社会学教授、副教授、讲师者名录，其中，属中国籍者共131人，留学美国者共71人，留学法国者共13人，留学日本者共10人，留学英国者共9人，留学德国者共4人，留学比利时者有1人。孙本文又介绍，民国学界译译社会学西书以美国为多，“初期的社会学大都译自日文，继而译自美国及英法，而尤以从美国书译译者为多”。（参见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胜利出版公司1948年版，第280页，第319~327页。）

于, 民国学面对美国相异的社会学理论, 其侧重与取舍如何, 又如何运用美国各种社会学理论构建自身理论体系, 其中创新成分多少? 厘清此问题确为考察民国时期社会学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而当前学界此项研究尚付阙如^①。

社会学中国化声中的美国范式

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社会学中国化呼声的核心内涵不外如下方面: 系统引进欧美诸国社会学理论与研究范式; 以融会欧美各家社会学理论为基础, 构建本国社会学理论体系; 将援自欧美或本国创新的学术理论应用于中国社会研究。1931年2月, 中央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本文即言, 要建设“中国化的社会学”, 首先应系统引介欧美重要社会学学说与方法, “就世界各国社会学上有名著作, 依次译”, 其次以欧美学理研究中国历史与现实问题, “我国自晚近以来, 社会上发生剧急变迁。在此变迁时期所产生之各种社会问题, 欲得适当之解决, 必须集全国社会科学家之心思才力共同研究计划而后可”^②。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吴文藻亦于1940年12月表示, 此前的中国社会学多为“舶来品”, 欲实现社会学“彻底的中国化”, 须将社会学理论与中国实际相验证, “理论符合事实, 事实启发理论, 理论与事实糅合一起, 获得一种新综合, 现实的社会学才能在中国的土壤上生根”^③。虽说构建中国自身理论体系与研究中国社会为 sociology 中国化之落脚点, 但引进欧美理论仍为 sociology 中国化之基础^④。不过, 民国学界引介欧美理论的繁复性, 不仅在于其所临欧美

① 有关民国社会学史研究始于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胜利出版公司1948年版), 近年具代表性的专著有郑杭生、李迎生《中国社会学史新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杨雅彬《近代中国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李培林、孙立平、王铭铭等《20世纪的中国: 学术与社会(社会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阎明《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社会学在中国》(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姚纯安《社会学在近代中国的进程(1895—1919)》(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陈新华《留美生与中国社会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等。重要论文则有李培林《20世纪上半叶社会学的“中国学派”》(《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2期)、桑兵《从眼光向下回到历史现场——社会学人类学对近代中国史学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刘雪婷《拉德克利夫·布朗在中国: 1935—1936》(《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1期)等。近年有关费孝通的研究渐多, 如谢立中主编《从马林诺斯基到费孝通: 另类的功能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赵旭东主编《费孝通与乡土社会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等。其中, 陈新华《留美生与中国社会学》与本文所论关系最近, 但陈著并未关注20世纪初美国由心理社会学研究到社会行为分析、文化社会学、人文区位学等新兴理论的转向及其对民国学界的影响, 亦未关注民国学界通过选择与融会美国新兴社会学理论对中国自身社会学理论的构建情况。

② 孙本文:《中国社会学之过去、现在及将来》, 中国社会学社编:《中国人口问题》(据世界书局1932年版影印),《民国丛书》第1编(19), 上海书店1989年版, 第18~19页。

③ 吴文藻:《社会学丛刊总序》(1940年12月于重庆), 费孝通译, Bronislaw Malinowski 原著:《文化论》(What Is Culture), 商务印书馆1944年7月重庆初版, 1946年5月上海2版, 1947年1月上海3版, 第1~3页。

④ 陈新华即注意到三四十年代社会学中国化与美国范式间的矛盾, 认为民国学界“主观意愿与实际操作之间也不可避免存在落差: 留美出身的社会学学者在建设中国社会学时潜意识的美国化倾向; 作为外来学科的社会学, 引进中国之后的舶来性质、依附品格与中国化探索之间的矛盾等等”。(参见陈新华:《留美生与中国社会学》,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第5页。)

学术派系各异,尤在各人对欧美不同理论取舍的相异。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20世纪20年代起民国学界多推重美国社会学范式。其原因不仅在于20年代以后民国社会学者多留美出身,亦在于20世纪初美国社会学研究实力渐超欧洲,并形成与欧洲全然不同的研究体系^①。

约在20年代,民国学界始感到社会学读物的缺乏。1923年,德普、延年在编写《社会学入门》时即谓,“社会学在中国还是很幼稚,没有可以读的书籍”^②。所以,民国时期社会学论著大量出版亦始于此时。孙本文即介绍,社会学理论著作1921年以前不多,1921年后稍见增加^③。20年代以降的社会学论著主要参照美国理论,包括两方面:20年代乃至30年代初对美国现成理论体系的移植;孙本文等留美归国学者自20年代后期开始融会社会行为分析和文化社会学等美国新兴理论构建自身社会学理论体系。而且,民国学界对社会学研究领域的认识大致遵从美国论述。吴泽霖和冯品兰分别注意到,美国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会曾于20年代初联合组成负责审定各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委员会,将社会学研究领域规划为三方面:第一,研究人类在家庭、学校、邻里、群众公众间及与他人相处而产生的各种相互影响与活动,以及由此产生的人情、风俗及社会组织;第二,研究人口问题对一切社会活动的影响,如人口数量、人口分布、人口品质(包括移民、优生、公共卫生)等问题;第三,研究贫穷和犯罪的原因及其预防与救济,同时,比较研究各种文明与野蛮社会,以明了各种社会的起源与演化方式^④。

20年代至30年代初,引介美国现成社会学理论体系为民国学界普遍风气。20世纪初美国社会学概论著作中,对民国学界影响较大者莫过于爱尔乌德(C A Ellwood)《社会学及现代社会问题》(*Sociology and Modern Social Problems*, 1910)、鲍格达(E S Bogardus)《社会学概论》(*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1913)、白克马(F W Blackmar)与季灵(J L Gillin)《社会学大纲》(*Outlines of Sociology*, 1915)、海逸史(E C Hayes)《社会学研究绪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ociology*, 1915)诸书^⑤。其中,爱尔乌德为密苏里

① 进入20世纪,美国社会学研究实力超乎欧洲之上。孙本文于30年代即称,美国“学者之众,著述之多,诚非他国所能望其项背”。(参见孙本文:《世界社会学之派别及其现状》,孙本文等著:《从社会学到社会问题》,中华书局1935年版,第22~23页。)

② 《编辑旨趣》,德普,延年编:《社会学入门》(学生门径丛书),世界书局1924年版,第1页。

③ 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胜利出版公司1948年版,第20、280页。

④ 吴泽霖:《新中华社会学及社会问题》(高级中学师范科用),新国民图书社1932年6月发行,1932年9月再版,第5~8页;冯品兰:《社会学纲要》,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8~9页。

⑤ 鲍格达为南加州大学教授,其《社会学概论》主要介绍芝加哥大学早期社会学研究方法。1925年,瞿世英将此书译为中文,作为高级中学教科书。(参见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胜利出版公司1948年版,第22~23、28页;孙本文:《社会学原理》(下)(据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影印),《民国丛书》第2编(15),上海书店1990年版,第249~250页。)《社会学大纲》为威斯康星大学教授季灵根据堪萨斯大学教授白克马撰《社会学要义》(*Elements of Sociology*, 1905)扩充而成,为美国通用大学教材之一。20年代,陶乐勤将此书以《社会学原理》为题译为中文出版;1933年,周谷城亦将此书以《社会学大纲》为题译为中文出版;1937年,吴霖译与夫人陆德音又将此书以《白季二氏社会学大纲》为题译为中文出版。海逸史为伊利诺伊州立大学教授,所撰《社会学研究绪论》于1933年由赵卓甫译为中文出版。曹聚仁等1927年编著《社会学大纲》、德普和延年1923年合著《社会学入门》、朱亦松1928年编著《社会学原理》等均参考此书。(参见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胜利出版公司1948年版,第27~26、43~44、48页。)

大学哥伦比亚分校教授。他在《社会学及现代社会问题》等书中提出社会心理交互论,认为社会是由人与人相互的心理作用而成的集团,社会学研究的中心问题是人们相互的心理关系^①。1920年12月,赵作雄将《社会学及现代社会问题》译为中文出版,在中国学界风行一时,“可说国人之稍知社会学,在初期此书的影响甚大”^②。之后,社会心理交互论即被中国学界奉为圭臬。德普、延年于1923年在《社会学入门》中即称,人们的相互心理作用是社会构成的核心要素,“社会是一团有意识关系的人群,藉着各人心的相感作用,互为因果,形成以公共生活联结的一个浑合体”^③。孙本文等20年代新晋社会学家亦对爱尔兰乌德此论评价颇高,并以此作为界定社会概念与社会学研究对象的首要标准。20年代至30年代初,若干中国学者自编社会学概论类书籍相继出版,诸如德普、延年《社会学入门》(世界书局1923年初版)、王平陵《社会学大纲》(上海泰东图书局1926年初版)、朱亦松《社会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28年初版)、陈翊林《社会学概论》(中华书局1930年初版)、余天休《社会学大纲》(北平文化学社1931年初版)、应成一《社会学原理》(民智书局1932年、1933年初版)、冯品兰《社会学纲要》(商务印书馆1934年初版)等。这些论著以引介美国现成社会学理论体系为主,自创成分较少。例如,它们因袭美国社会学理论,多以整体社会为社会学研究对象。德普、延年《社会学入门》认为,“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是全社会,决不是或种社会,或社会的一部分”^④。陈翊林《社会学概论》将社会学定义为研究人类社会生活的动力、形态和进化的科学^⑤。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应成一在《社会学原理》中认为,社会学就是运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的科学,应以社会综合现象为研究对象^⑥。冯品兰《社会学纲要》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当为社会之全体,而非其某部份或某方面”^⑦。

虽然迄30年代初诸多学者仍囿于对美国现成理论体系的引介,但自20年代后期开始,孙本文、吴景超、黄凌霜(文山)、杨开道、吴泽霖等留美归国社会学者始融汇社会行为分析、文化社会学等美国新兴社会学理论,致力于构建中国自身社会学理论体系,孙本文则为执牛耳者。其论著主要为孙本文撰写或主编的《社会学ABC》(1928年7月世界书局初版)、社会学丛书(1929年至1930年世界书局初版)^⑧、《社会学原理》(1935年1月商务印书馆初版)。其中,《社会学原理》为民国时期理论社会学扛鼎之作。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承信于1937年4月称此书为中国学界超脱欧美理论,构建自身社会学理论之始,表示“近数年来我想一定有不少的社会学同志在那里创造中国的社会学系统。孙本文先生

① 李剑华:《社会学史纲》,世界书局1930年版,第102~103页。

② 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胜利出版公司1948年版,第22~23页,第28页。

③ 德普,延年编:《社会学入门》(学生门径丛书),世界书局1924年版,第25、63~64、66页。

④ 德普,延年编:《社会学入门》(学生门径丛书),世界书局1924年版,第19~20页。

⑤ 陈翊林:《社会学概论》,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1~6、18页。

⑥ 应成一:《社会学原理》(上卷)(社会科学丛书),民智书局1932年版,第2~10、75~76页。

⑦ 冯品兰:《社会学纲要》,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7~8页。

⑧ 此丛书包括孙本文《社会学的领域》、《社会的文化基础》、《社会变迁》,吴景超《都市社会学》、《社会的生物基础》、《社会组织》,杨开道《农村社会学》、《社会研究法》,潘菽《社会的心理基础》,寿勉成《社会的经济基础》,黄国璋《社会的地理基础》,黄凌霜《社会进化》,吴泽霖《社会约制》,李剑华《社会学史纲》、游嘉德《人类起源》,共15种。

的《社会学原理》(上海商务大学丛书教本,民国廿四年一月出版,全书有七百余页)便是一例”^①。他们紧跟美国社会学最新趋势。20世纪初为美国社会学研究重要嬗变期,注重研究人们内在心理的、哲理式的早期心理社会学日渐式微,强调结合社会环境分析人们外在行为的社会行为分析理论、以社会文化研究为旨趣的文化社会学日愈兴盛。孙本文即将美国社会学研究分为两个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早期心理社会学为“系统社会学”或“社会学理论”时期;20世纪初兴起的社会行为分析、文化社会学等理论为“分析社会学”或“社会学之实际研究”时期。他认为,美国早期心理社会学实为一种哲学,试图以自己主观设想的简单原理解释一切社会现象,不陷于误谬,即为片面之见;而社会行为分析、文化社会学以及人文区位学等现代社区研究“始由主观的哲学态度,渐渐入于客观的科学途径”^②。

受美国社会行为分析与文化社会学理论影响,孙本文等构建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以社会行为与社会文化分析为基础。孙本文借鉴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派克(R E Park)、蒲其斯(E W Burgess)《社会学导言》(*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 1921)所言“社会学是研究共同行为(Collective behavior)的科学”,提出“共同”(Collective)一语不如“社会”更具“概括”性,社会学研究对象应为“社会行为”^③。他又借鉴爱尔乌德社会心理交互论,提出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社会行为应为社会成员的交互行为。1928年7月,他在《社会学ABC》中称,“社会学是研究人类社会行为的科学”,社会行为即“二人以上交互影响的共同行为”^④。1929年,他在《社会学的领域》中又表示,社会行为包含两个基本要素,即二人以上的集合、二人以上集合后的“互相交通”^⑤。孙本文不仅注重社会行为研究,亦强调社会文化研究,认为须将社会行为置于社会文化环境中进行分析。由此,他将社会文化视作社会学研究的最中心问题。1934年8月,孙本文在《社会学原理》自序中表示,社会学的任务是研究人类共同生活的原理原则,而文化则是人类共同生活的核心论题,文化既是人类调适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的产物,又反过来极大影响着人类对于环境的调适,“于是,文化为人类社会之一种势力,一种支配势力。举人类生活之全体各部,莫不有文化贡献,莫不为文化支配”^⑥。洎乎三四十年代,孙本文等构建的社会学理论得到学界高度认同,其将社会行为视作社会学主要研究对象的观点颇具指标意义。1941年10月,无锡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教授童润之在《乡村社会学》中即认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现象、生活或行为的科学。从分析这种现象、生活或行为的种种物理的、生理的、心理的因

① 赵承信:《社会学产生的条件及中国社会学的建设》(1937年4月),《社会科学概论选读》,燕京大学法学院1938年版,第559~560页。

② 《美国社会学现状及其趋势》(《东方杂志》第23卷第12号),孙本文:《文化与社会》,东南书店1928年9月初版,1930年9月再版,第137、115~116、119~120、121、132页;孙本文:《社会学上之文化论》,朴社1927年版,第1~8页。

③ 孙本文:《社会学原理》(上)(据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影印),《民国丛书》第2编(15),上海书店1990年版,第16页。

④ 孙本文:《社会学ABC》,世界书局1928年7月初版,1929年1月再版,第1~4页。

⑤ 孙本文:《社会学的领域》(孙本文主编《社会学大纲》第1种),世界书局1931年版,第8~11页。

⑥ 孙本文:《序》(1934年8月27日),孙本文:《社会学原理》(上)(据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影印),《民国丛书》第2编(15),上海书店1990年版,第1~2页。

素，以解释社会变迁的形态，并推测社会演进的将来”^①。

社区概念虽非美国学界首先提出，但作为社会学中较具社会实证特征的研究领域，现代农村与都市社区研究于20世纪初兴起于美国，并在民国学界有深刻影响。受美国学界影响，民国学界阐释的社区概念，不仅强调社区的共同生活要素，亦强调其地域要素。西方学界最初阐释社区概念，多强调其共同生活特征。如时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的麦其维(R M MacIver)在《共同社会》(*Community: A Sociological Study*, 1917)中即认为，“共同生活”包括共同志愿(Common will)、共同事业(Common interests)等方面，是社区的基本要素^②。而孙本文、杨开道、吴文藻等对社区概念的阐释，更强调其地域要素。1928年7月，孙本文在《社会学ABC》中将社区称作“区域社会”，认为“凡一个社会和一个区域，发生密切关系的，就叫区域社会”^③。1929年8月，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杨开道在《农村社会学》中将社区称作“地方共同社会”，认为农村社区“是有一定区域的。他的人民，是限于一个地方以内的”^④。1934年12月，吴文藻亦解释，“社区”指“一地人民的实际生活”，包括人民、人民所居处的地域、人民生活的方式或文化三个要素^⑤。民国学界对社区概念的此种理解源于美国现代农村、都市社区研究。例如，美国农村社会学家西门斯(N L Sims)在《农村共同社会》(*The Rural Community*, 1920)中便指出农村社区的地域要素，认为农村社区由许多具有“共同事件”的农家组成，而共同地域(A common locality)则为“共同事件”的重要方面^⑥。

美国现代农村、都市社区研究的兴盛导致农村社会学、都市社会学的兴起，20世纪20年代为美国两门学科形成的关键期。而中国两门学科的兴起不仅时间上几与美国同步，且理论模式亦多取自美国。美国农村社会学大致于20年代形成较完整的论述构架^⑦。中

① 童润之：《乡村社会学纲要》，正中书局1941年10月初版，1944年5月3版，第2~3页。

② 杨开道：《农村社会学》，世界书局1929年版，第8~9页；杨开道：《农村社会》，世界书局1930年1月初版，1931年12月4版，第7、14~15页。

③ 孙本文：《社会学ABC》，世界书局1928年7月初版，1929年1月再版，第76页。

④ 杨开道：《农村社会学》，世界书局1929年版，第8~9页。

⑤ 《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意义和功用》(1935年)，《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144~145、146~148页。

⑥ 杨开道：《农村社会》，世界书局1930年1月初版，1931年12月4版，第15~24页。

⑦ 20年代前后，美国出版多种农村社会学专著，如吉勒特(J M Gillette)《建设的农村社会学》(*Constructive Rural Sociology*, 1913)、葛尔宾(C J Galpin)《农村生活》(*Rural Life*, 1918)、费廉(J Phelan)《农村社会学读本》(*Readings in Rural Sociology*, 1920)、西门斯(N L Sims)《农村共同社会》(*The Rural Community*, 1920)和《农村社会学初步》(*Elements of Rural Sociology*, 1928)、吉勒特(J M Gillette)《农村社会学》(*Rural Sociology*, 1922)、桑德逊(D Sanderson)《农民与农村社会》(*The Farmer and his Community*, 1922)、傅克德(P L Vogt)《农村社会学概论》(*Introduction to Rural Sociology*, 1922)、何桑(H B Hawthorn)《农村生活的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Rural Life*, 1926)、戴洛(C C Taylor)《农村社会学》(*Rural Sociology: A Study of Rural Problems*, 1926)、蓝奎士(G W Lundquist)与高维(T N Caver)《农村社会学原理》(*Principles of Rural Sociology*, 1927)、黑士(A W Hayes)《农村社会学》(*Rural Sociology*, 1929)、沙罗根(P Sorokin)与钱秣门(C C Zimmerman)《农村与都市社会学原理》(*Principles of Rural-Urban Sociology*, 1929)等。(参见魏重庆：《社会学小史》，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75~77页。)

国农村社会学研究亦于二三十年代起步,代表性论著有杨开道《农村社会学》(世界书局1929年8月初版)和《农村社会》(世界书局1930年1月初版)、言心哲《农村社会学概论》(中华书局1934年3月初版)、童润之《乡村社会学纲要》(正中书局1941年10月初版)等。杨开道首先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将美国农村社会学理论系统引介到中国,但以关注农村社区研究为主;言心哲、童润之等于30年代中期后致力于构建中国农村社会学理论框架。20年代亦为美国都市社会学起步期^①。民国都市社会学亦于二三十年代起步。时任南京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的吴景超于1929年8月出版《都市社会学》,系统介绍芝加哥大学都市社区研究方法。邱致中则于1934年出版《都市社会学原理》致力于构建都市社会学理论体系。民国农村社会学与都市社会学理论模式亦多源自美国。衣阿华州立学院(Iowa State College)教授何桑、密歇根州立学院(Michigan State College)教授白德菲(K L Butterfield)分别为杨开道的硕士、博士导师。杨开道《农村社会学》即主要参考何桑《农村生活的社会学》和白德菲《农场主与新时代》(*The Farmer and the New Day*, 1919)两书。他在《自序》中谓,此书以其农村社会学讲稿选录而成,“都是两位前辈的赐与”^②。中央大学社会学教授言心哲撰《农村社会学概论》与童润之撰《乡村社会学纲要》试图通过融会美国各家农村社会学理论,构建完整的乡村社会学论述体系。两书编写体例均以美国相关论著为蓝本。言著辟专章阐述的农村社会学基本理论、农村人口、农村生活程度、农村社会病态与社会服务、农村卫生、农村娱乐与美术、农村领袖、农村社会心理、农村社会化、农村组织、农村家庭、农村经济、农村教育、农村调查、农村自治诸问题,吉勒特、傅克德、何桑、戴洛、西门斯、黑士等撰美国诸种农村社会学著作亦多辟专章论述^③。童润之《乡村社会学纲要》则采用西门斯《农村社会学初步》编写体例,分为绪论、人口、文化、组织、经济五编^④。民国时期都市社会学研究与美国芝加哥大学都市社区研究有直接渊源。吴景超于1925年至1928年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故其《都市社会学》主要内容为介绍该系都市社区研究方法。致力于构建都市社会学理论体系的邱致中为上海江南学院、暨南大学教授。其《都市社会学原理》则参考安迪生、林德门《都市社会学》。他同意安迪生、林德门关于都市社会学应以都市社会(Urban society)而非都市社区(Urban community)为研究对象的观点^⑤。实际上,邱致中阐发的都市社会学理论仍与芝加哥大学有相当学术关

①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于1915年始开展芝加哥都市社区研究,派克、蒲其斯于1925年编辑出版《都市》(*The City: Suggestions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Human Behavior in the Urban Environment*, 1925),系统阐述研究都市社区的人文区位学方法。安迪生(N Anderson)和林德门(E C Lindeman)于1928年出版《都市社会学》(*Urban Sociology*, 1928),为美国都市社会学理论体系构建之始。美国都市社会学相关论著还有巴特里特(D W Bartlett)《模范都市——近代都市之社会学的研究》(*The Better City: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a Modern City*, 1907)、喀蒲士(W P Capes)《近代都市及市政府》(*The Modern City and its Government*, 1922)等。裴福德(S E W Bedford)在《都市社会学读本》(*Readings in Urban Sociology*, 1927)中则首次使用都市社会学(Urban sociology)概念。(参见魏重庆:《社会学小史》,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73~75页。)

② 杨开道:《自序》(1928年秋),杨开道:《农村社会学》,世界书局1929年版,第1~2页。

③ 参见言心哲:《农村社会学概论》(中华书局1934年3月初版,1939年8月再版)各章参考书目。

④ 童润之:《乡村社会学纲要》,正中书局1941年10月初版,1944年5月3版,第10~11页。

⑤ 邱致中:《都市社会学原理》(都市社会学丛书第二种),上海有志书屋1934年版,第261~263页。

联，因为安迪生、林德门对都市社会学理论的阐述仍基于该校都市社区研究。安迪生 20 年代早期在该校社会学系学习期间，曾随派克、蒲其斯从事都市社区研究，所撰《走江湖的》(*The Hobo*, 1923)被纳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丛书出版。

迄 30 年代，实现社会学中国化几成民国社会学界共识。此种认知呈现出民国学界对基于西方社会学理论构建本国学术体系，并将此种理论应用于中国社会研究的紧迫感。民国学界对自身社会学理论的构建，不仅包括结合社会文化环境分析人们行为的社会行为与文化研究范式，亦包括以农村、都市社区研究为中心范式的农村社会学、都市社会学论说体系。其中，美国学术范式的影响尤其深远。

移植与派分

19 世纪中叶孔德提出建立社会学后，欧美学界关于社会学研究范式、研究对象、研究领域等认知分歧极大，不仅欧洲各国各异，美国与欧洲更截然不同。民国学界在移植欧美各家理论时，自然面临如何取舍难题。然而，民国社会学界是否存在“入主出奴”的派别？事实上，除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外，民国学界虽在引介西方学说过程中不免有所偏重，但难说存在截然相隔的派别。孙本文曾谓，各国社会学“因历史背景不同，发展路径各异，故各国社会学流派至为分歧。初学者非入主出奴，即顾此失彼”^①。显然，孙本文所谓“入主出奴”，只是“初学者”的情况。孙本文又称，其《当代中国社会学》之所以用“流派”而非“派别”一语，是因为他否认民国学界存在“各不相容的派别”——“流派”比“派别”在强调各“派”之“别”的语义上较为模糊，所谓民国社会学“流派”只可算是“有所偏重的研究趋向”，在乎各家研究“重心”与专长不同，谈不上“划然分界”^②。

在民国时期理论社会学学术体系建构方面，以孙本文为首的留美学者群体位居主流。此群体初由 20 年代末编撰社会学丛书相聚，虽各人研究方向并不尽同，但注重社会的文化环境要素，从而否定注重人们内在心理研究的美国早期心理社会学则为其共同取向^③。1935 年 1 月，孙本文在《社会学原理》中便将美国早期心理社会学视作过时之论，认为沃德、季廷史、司马尔的学说合“最近社会学的趋势”，“惟以晚近社会学之发展衡之，似已失其原有价值”^④。孙本文诸人颇看重美国 20 世纪初结合社会环境研究人们心理的社会心理分析理论。密歇根大学教授柯莱(C H Cooley)在《人性与社会秩序》(*Human Nature*

^① 孙本文：《世界社会学之派别及其现状》，孙本文等著：《从社会学到社会问题》，中华书局 1935 年版，第 1 页。

^② 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胜利出版公司 1948 年版，第 238 页。

^③ 美国心理社会学兴盛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以布朗大学教授沃德(L F Ward)欲望(Desires)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季廷史(F H Giddings)“同类意识”(Consciousness of Kind)说、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司马尔(A W Small)兴趣(Interest)说等理论为代表，均强调由人们内在心理分析社会现象，认为“人类社会现象不过人类心理作用的表现。人类心理作用是社会现象的原动力”。(参见孙本文：《世界社会学之派别及其现状》，孙本文等著：《从社会学到社会问题》，中华书局 1935 年版，第 7 页。)

^④ 孙本文：《社会学原理》(下)(据商务印书馆 1947 年版影印)，《民国丛书》第 2 编(15)，上海书店 1990 年版，第 251、253 页。

and the Social Order, 1902)、《社会组织》(Social Organization, 1909)、《社会过程》(Social Process, 1918)等书中提出,个人与社会是同一现象的两面,社会学须研究社会生活中的个人心理问题^①。孙本文高度评价柯莱学说,认为其著作“讨论个人和社会的关系、社会对于个人发达的影响及人与人间的相互关系,最为精辟”^②。威斯康星大学教授罗斯(E A Ross)和俄亥俄大学教授伦姆雷(F E Lumley)分别在《社会约制》(Social Control, 1901)、《社会约制的工具》(Means of Social Control, 1925)等书中阐明社会约制理论(Theory of Social Control)。罗斯认为,社会控制势力产生于人与社会环境间的心理的交互作用^③。罗斯和伦姆雷分别为上海大夏大学社会学教授吴泽霖的硕士、博士导师,故吴泽霖 1931 年 6 月出版的《社会约制》多继承二人相关论述^④。

孙本文等注重社会文化环境要素论者大力引介美国社会行为分析理论。20 世纪二一十年代,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将社会心理分析理论发展为社会行为分析理论,强调社会学研究应以结合社会环境分析外在的社会行为为中心。其代表者有汤麦史(W I Thomas)、白乃德(L L Bernard)、范黎庶(E Faris)、派克、蒲其斯等^⑤。孙本文极认同此种研究方法,于 1926 年 12 月称赞该系研究方法切实,“持严格的科学态度”^⑥。关于此理论的核心观念,吴泽霖于 1932 年 6 月所言较赅。他介绍,此种理论认为除性、惧、怒等少数先天简单的行为外,人类多数行为均由后天获得,“社会上一切过程和活动,无非是各种环境——自然的、文化的——所引起个人间的反应,这些反应同时也就是一种新刺激,可以引起他人或他种的反应”^⑦。孙本文留美期间对此理论兴趣浓厚,曾于 1925 年秋到芝加哥大学做访问研究,选修范黎庶《高级社会心理学》与《社会态度》、派克《集体行为》等课^⑧。所以,孙本文回国后反复强调社会环境对人们行为的制约作用。他在《社会学原理》中即申明,“行为的特质,非先天的特性,而是后天获得的”^⑨。他尤其推崇汤麦史、派克、蒲其斯等的人格分析(Personality analysis)理论。汤麦史、派克、蒲其斯等强调人格(Personality)由社会环境养成。派克、蒲其斯所著《社会学导言》特别阐明作为生物人的“个人”(Individual)

① 李剑华:《社会学史纲》,世界书局 1930 年版,第 100~101 页。

② 孙本文:《社会学原理》(下)(据商务印书馆 1947 年版影印),《民国丛书》第 2 编(15),上海书店 1990 年版,第 256~257 页。

③ 魏重庆:《社会学小史》,商务印书馆 1940 年版,第 23~24 页。

④ 吴泽霖:《自序》(1930 年 1 月),吴泽霖:《社会约制》(孙本文主编《社会学大纲》第 11 种),世界书局 1931 年版,第 1~2 页。

⑤ 汤麦史于 1896 年在芝加哥大学获社会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10 年始任该校社会学系教授,1923 年至 1928 年任纽约社会研究新校(New York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教授。白乃德于 1910 年获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先后任明尼苏达大学、康乃尔大学教授。范黎庶、派克、蒲其斯则长期任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⑥ 《美国社会学现状及其趋势》(《东方杂志》第 23 卷第 12 号),孙本文:《文化与社会》,东南书店 1928 年 9 月初版,1930 年 9 月再版,第 143~144 页。

⑦ 吴泽霖:《新中华社会学及社会问题》(高级中学师范科用),新国民图书社 1932 年 6 月初版,1932 年 9 月再版,第 35~37 页。

⑧ 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胜利出版公司 1948 年版,第 241~243 页。

⑨ 孙本文:《社会学原理》(上)(据商务印书馆 1947 年版影印),《民国丛书》第 2 编(15),上海书店 1990 年版,第 178~182 页。

与作为社会人的“人”(Person)的区别^①。孙本文在《社会学原理》中亦称,人格的养成取决于社会环境,“在相当的时期以内,一个人在何种社会环境中生活,似乎即可养成何处的人格”^②。受孙本文邀请撰写《社会的心理基础》的中央大学心理系教授潘菽亦看重社会行为分析理论,认为社会行为分析是社会分析的首要问题,“个人在社会环境中的行为的方式和规律对于社会的关系是根本的、主要的”^③。

孙本文诸人亦大力移植美国文化社会学理论。美国文化社会学的理论先导为孙末楠(W G Sumner)民俗(Folkways)论^④;而以鲍亚士(F Boas)为代表的文化人类学文化分析方法则为其理论基础^⑤。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乌格朋(W F Ogburn)于1922年出版《社会变迁》(*Social Change*, 1922),将文化人类学文化分析方法应用于社会学领域,正式揭橥文化社会学旗帜。南加州大学教授恺史(C M Case)撰《社会学大纲》(*Outlines of Introductory Sociology*, 1924)亦为20年代美国重要文化社会学论著。文化社会学的兴起表明美国社会学研究对象由起初的内在心理,到外在社会行为,最终到社会文化的转化^⑥。孙本文即指出,以乌格朋《社会变迁》出版为标志,美国社会学研究由“向来奉为圭臬之心理学说”转向“文化分析”,由“主观臆想时期”进入“客观分析时期”^⑦。孙本文接受

① 叶法无:《近代各国社会学思想史》,大陆书局1933年版,第130~131页。

② 孙本文:《社会学原理》(上)(据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影印),《民国丛书》第2编(15),上海书店1990年版,第198~206页。

③ 潘菽:《社会的心理基础》(据世界书局1931年版影印),《民国丛书》第1编(15),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1~6页。

④ 孙末楠为耶鲁大学教授。其在《民俗论》(*Folkways*, 1906)中所谓民俗“乃属于人类之关系、俗例、制度等之一种‘超机关’系统”,与“文化”概念含义相近。(参见孙本文:《社会学上之文化论》,朴社1927年版,第41~43页。)

⑤ 鲍亚士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他一改此前人类学囿于人类体质研究的传统,提倡文化研究,主张以分析一个文化区域内部的文化因子为基础,进而分析各种文化之间的关系及异同。(参见魏重庆:《社会学小史》,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60~61页。)此后,其弟子罗维(R H Lowie)、克鲁伯(A L Kroeber)、戈登卫然(A A Goldenweiser)以及卫史莱(C Wissler)、笄然(A M Tozzer)等于1920年前后出版多种著作,认为社会变迁主要为文化变迁,并阐述文化特质(Culture trait)、文化丛(Culture complex)、文化模式(Culture pattern)、文化区(Culture area)、文化传播(Culture diffusion)等问题。

⑥ 乌格朋先后于1909年、1912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博士学位,为鲍亚士、季廷史弟子。(参见孙本文:《社会学上之文化论》,朴社1927年版,第51~52页。)恺史与乌格朋并非师出同门,于1912年在沃德门下获得布朗大学硕士学位,后进入威斯康星大学师从罗斯,于1915年获得博士学位。此外,20年代美国文化社会学代表人物尚有乌格朋弟子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教授卫莱(M M Willey)、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讲师海史各费(M J Herskovits),以及史密斯女子学院(Smith College)教授汉根史(F H Hankins)等。不过,美国文化社会学仍具综合研究趋向。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亚伯尔(T Abel)于1930年曾撰文指出,文化是人类所有行为的总体(Totality of human behavior),包括经济、政治、技术、宗教等各方面活动及其相应产物,仍分别属于各门特殊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文化的全领域,既为其他各社会科学所领有,如此,文化社会学所能求得的独立对象,势必只有‘抽象的搜讨’(Abstract approach)”,本质上仍为“综合的、哲学的(文化哲学)”。(Is a Cultural Sociology Possibl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35, No. 5, 1930)(参见魏重庆:《社会学小史》,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81~82页。)

⑦ 孙本文:《社会学上之文化论》,朴社1927年版,第49页。

乌格朋观点,将文化视作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将社会变迁等同于文化变迁。1929年8月,他在《社会的文化基础》中说,“文化是人类社会最彻底、最普遍的一种势力”,所以,文化变迁是社会变迁的核心,“社会变迁,除开人口的生物变动外,只有文化变迁”^①。中央大学社会学教授黄凌霜为哥伦比亚大学硕士,亦深受乌格朋文化社会学理论影响。他于1929年10月在《社会进化》中强调,社会进化就是文化进化,“我们研究社会的进化差不多就是研究文化的进展”^②。而且,孙本文、黄凌霜等承美国文化社会学余绪,亦主张以文化变迁代替文化进化概念^③。1929年10月,孙本文在《社会变迁》中称,此前社会学、人类学所言“社会进化”,“不足以概括社会变迁,因为社会变迁,不尽是进化的。人类社会是永久继续的在那儿变迁,有许多变迁,并无进化的意味”^④。黄凌霜在《社会进化》中亦认为,不能单纯以“进步”说明文化演变,“进步”概念并不能应用到文明的各方面。为此,他将该书第七章题为“文化变迁的因子”,而非“文化进化的因子”^⑤。

民国学界对文化概念内涵的理解虽因理论来源不同而表述各异,但核心理念却无不同,均以英国人类学家泰勒所言非物质文化为基础,增加物质文化内容。1871年,泰勒在《初民文化》(*Primitive Culture*, 1871)中指出,“文化是一种复杂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余从社会学得的能力与习惯”^⑥。乌格朋于1922年在《社会变迁》中以泰勒所言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等非物质文化为基础,增加建筑物、工具、工艺品等物质文化^⑦。英国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在《文化论》中将文化分为“物质底层”、“社会组织”、“语言”三因子(或单列“文化的精神方面”,成为四因子),并进而将文化分为“经济”、“教育”、“政治”、“法律与秩序”、“知识”、“巫术宗教”、“艺术”、“娱乐”八方面(有时在经济前单列技术,成为九方面)^⑧。费孝通介绍,与泰勒相比,马林诺斯基列举的文化内容多了物质部分,而他补充的社会组织则可包括在泰勒所言社会成员从社会学得的“能力”和“习惯”中^⑨。孙本文等遵从乌格朋两分法。1929年8月,

① 孙本文:《社会的文化基础》,世界书局1929年版,1932年9月3版,《序言》(1929年5月)第1~2、126~127页。

② 黄凌霜:《社会进化》,世界书局1929年版,第1页。

③ 近代人类学大致分为进化派(The Evolutionary School)、分播派(The Diffusionists)、批评派(Critical School of Ethnology)。进化派以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 Tylor)、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L H Morgan)等为代表,主张世界各地人类社会虽发展阶段不同,但均各自遵循相同途径和次序进化。分播派以德国格雷布内尔(F Grabner)、英国黎佛斯(W H Rivers)等为代表,认为世界各民族文化通过接触而分播,世界各种类似文化同出一源,否认进化的存在。以鲍亚士为代表的美国文化人类学则为批评派,高揭“反进化论”(Anti-evolution)旗帜,同时修正文化分播理论,将文化分播现象限于一定区域。乌格朋等美国文化社会学家受其影响,亦主张以文化变迁代替文化进化概念。

④ 孙本文:《社会变迁》(孙本文主编《社会学大纲》第9种),世界书局1931年版,第1~3页。

⑤ 黄凌霜:《社会进化》,世界书局1929年版,第74、99~100页。

⑥ 孙本文:《社会的文化基础》,世界书局1929年8月初版,1932年9月3版,第23~25页。

⑦ 孙本文:《社会学上之文化论》,朴社1927年版,第52~55页。

⑧ 《论文化表格》(1938),《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193~196、218、222~224页。

⑨ 《从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1995年5月28日),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47~48页。

他在《社会的文化基础》中解释说,“凡人力所创造之具体的事物,叫做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例如衣服、舟车、桥梁、机械、器具等是”;“凡人工所创造之抽象的事项,叫做非物质文化(Non-material Culture),例如风俗、法律、宗教、道德之类,皆是。”^①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生则遵从马林诺斯基三因子、八方面说。吴文藻于1938年在《论文化表格》文中认为,马林诺斯基之说不仅“与事实最相契合”,且在研究方法上具有可行性^②。这种理解的异曲同工说明,迄二三十年代,民国学界对文化内涵的理解已具相当共识。

透过1928年至1929年孙本文与潘光旦之间的争论,可以窥见注重遗传要素的优生学与注重社会环境要素的社会行为与文化研究之间的分立。而两派学术渊源均在美国。潘光旦在美国所习专业偏重生物与遗传。他于1922年入美国新罕布什尔州达特茅斯学院学习生物学,获学士学位,又于1924年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学习动物学、古生物学、遗传学。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他经常到纽约冷泉港优生学记录局(Eugenics Record Office,潘光旦称“美国优生学馆”)学习,其诸多论点即来自该局达文包(C B Davenport)、劳弗林(H H Laughlin)等学者。其注重社会生物基础的研究趋向与注重社会文化环境要素的孙本文诸人颇不相合。在美留学期间,他即于1924年8月撰文指责社会文化环境论的错误。他观察到,“美国社会学家十有六七主偏狭之环境说”,“自西方归来而未受生物学训练之中国社会学者大都信仰环境论,此是意计中事,习他科者一般之印象亦大率趋向是说”^③。孙本文是优生论的坚决批判者^④。这与他于英国心理学家麦独孤(W McDougall)本能论的批判态度密切相关^⑤。他于1928年撰《文化与优生学》一文批评优生学家忽视文化对人类的后天影响,强调人类能力并非先天的,多受后天文化影响,“我们所见人类种

① 孙本文:《社会的文化基础》,世界书局1929年8月初版,1932年9月3版,第23~25、27~29页。

② 《论文化表格》(1938),《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193~196、218、222~224页。

③ 《西化东渐及中国之优生问题》(1924年8月),潘光旦:《优生概论》(据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影印),《民国丛书》第1编(20),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53页。

④ 民国时期诸多注重社会文化环境的论者并非像孙本文那样走极端,多部分承认优生学的合理性。吴景超即主张,根据事实取舍生理遗传论与社会环境论,“假如事实告诉我们遗传的力量大,我们便信遗传的力量大。事实告诉我们环境的力量大,我们便信环境的力量大”。(参见吴景超:《自序》(1930年1月),吴景超:《社会的生物基础》(孙本文主编《社会学大纲》第4种),世界书局1931年版,第1~2页。)吴泽霖亦表示,“我们虽不敢完全采纳优生学家的一切办法,但是,他们的根本主张乃是无可否认的,我们只要承认天才与愚钝有遗传根据的话,至少应赞成限制低能者的繁殖的主张,至少不应使低能者自由移入境内”。(参见吴泽霖:《新中华社会学及社会问题》(高级中学师范科用),新国民图书社1932年6月初版,1932年9月再版,第272~274页。)

⑤ 孙本文在《社会学原理》中称,“大概最近心理学家,似已不承认人类有种种本能。所谓人类的本性,似乎是指神经系统的一种特殊构造,就是刺激与反应的机械”。(参见孙本文:《社会学原理》(上)(据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影印),《民国丛书》第2编(15),上海书店1990年版,第198页。)他否定本能论亦受美国学界影响。本能论由麦独孤于1908年在《社会心理学绪论》(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Psychology, 1908)中作系统阐述,认为本能(Instincts)主要源于人们生理遗传,是人们社会生活、人格发展的基础。本能论于1910年至1920年一度兴盛于欧美学界,1920年后始受美国学界猛烈攻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邓禄普(K Dunlap)及白乃德、范黎庶等尤为急先锋。(参见孙本文:《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发展与趋势》,孙本文编:《现代社会科学趋势》,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378~382、385~386页。)

种方面的活动,全都是受着文化影响以后的表现,并不是人类先天就有种种能力,使他不得不有种种方面的活动”^①。1929年10月,时任上海光华大学、中国公学教授的潘光旦发表《优生与文化》回应孙本文的批评,孙本文亦发表《再论文化与优生学》与潘光旦商榷。正因二人的学术分歧,孙本文主编社会学丛书,邀请吴景超而非潘光旦撰写《社会的生物学基础》,而在此问题上最有发言权者是致力于优生学研究的潘光旦。潘光旦则一直心存耿耿,直到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时仍批评孙本文等门户之见过深,表示“真正所谓科学的解释决不惮旁征博引,而唯恐失之偏隘;一定要于划出一块自己的园地以后,说不但我所研究的对象在此,而我所要寻求的解释也只在于此,且即此已经足够,则不但失诸偏隘,失之自封,并且失诸割裂,失诸断章取义”^②。

20世纪初美国学界现代社区研究存在三种路径:一为以文化社会学为方法的现代社区研究,林德夫妇(R Lynd & H Lynd)《中镇:一种现代美国文化的研究》(*Middletown: A Study in Modern American Culture*, 1929)为其代表著作;二为芝加哥大学以人文区位学为方法的都市社区研究;三为农村社会学界开展的农村社区研究。民国学界对此三种社区研究均极关注。孙本文相当看重运用美国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文化分析方法开展的现代社区研究。他在《社会学原理》中指出,现代社区调查难与鲍亚士等美国文化人类学者对北美初民社区的考察相媲美,只有美国中镇(Middletown)调查较完善。显然,他较推崇林德夫妇所作《中镇:一种现代美国文化的研究》,认为此书“系一种别开生面的社会研究。用人类学家研究初民社会的方法,以分析现代文化。以一小都市‘中镇’为对象,而研究其全社会各方面的景况。在方法上为有特殊贡献之著作”^③。派克、蒲其斯主持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开展的芝加哥都市社区研究系运用人文区位学方法,主旨为结合芝加哥各区域社会文化环境解析各区域社会行为的异同及其形成原因。吴景超、孙本文等对此种研究方法比较关注。他们尤其关注芝加哥大学考察各城区社会文化环境和社会行为异同的“自然区域”(Natural areas)研究方法。在民国学界,吴景超与芝加哥大学都市社区研究关系最密切,介绍此种研究方法即为其1929年8月出版的《都市社会学》的主要内容,故孙本文称吴著“多少含有芝加哥学派的意味”^④。吴景超重点介绍了其绘制和分析都市社会问题区域分布地图(吴景超称“暗射地图”)方法。他介绍,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实验室有很多标满芝加哥犯罪、离婚等各种社会问题的“暗射地图”。他们首先通过绘制此种地图,了解不同社会问题在都市各区域中的不同分布,再深入各区域进行实地调查,分析各区域社会问题集中的深层社会原因。他们发现,芝加哥各区域不同的社会环境导致人们行为的差异,从而出现不同的社会问题^⑤。孙本文则在《社会学原理》中介绍芝加哥大学“自然区域”概念。

① 《文化与优生学》(《社会科学杂志》第3期),孙本文:《文化与社会》,东南书店1928年9月初版,1930年9月再版,第27~31页。

② 潘光旦:《优生原理》(1949年4月观察社初版),《潘光旦文集》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4页。

③ 孙本文:《社会学原理》(下)(据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影印),《民国丛书》第2编(15),上海书店1990年版,第234、268~269页。

④ 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胜利出版公司1948年版,第156~157页。

⑤ 吴景超:《都市社会学》(据世界书局1929年版影印),《民国丛书》第1编(15),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60~63页。

他介绍,各种“自然区域”表现为不同的文化、人口、社会行为特征。在都市社区中,不同种类的人群和机构存在区域汇集的现象,同类人群、相近的企业和事业机构往往聚集于一处,从而形成各种“自然区域”^①。杨开道等农村社会学者则看重美国农村社区调查方法,认为这是农村社会学步入科学之途的重要手段。杨开道于1930年1月在《农村社会》中强调,农村社区研究应以实地调查为主,“因为实地研究,才能得着真正的事实”^②。1934年3月,言心哲在《农村社会学概论》中注意到,美国白勒(L H Bailey)、吉勒特、葛尔宾等农村社会学家均强调农村社区调查的重要。他由此认为,“用科学方法、客观态度,来调查农村,是研究农村社会不可少的步骤,并且是使农村社会学成为科学的必由之路”^③。

20世纪初为美国社会学重要转型期,早期心理社会学日渐式微,诸如社会行为分析、社会文化研究、人文区位学、社区调查等一系列全新研究趋向日益显现。民国社会学界则与美国社会学研究范式直接接轨,并呈现出明显趋新态势。他们大力移植上述美国新兴社会学理论,并取兼收并蓄办法。由此而言,民国学界针对美国各种社会学理论的派别意识较淡薄,所不同者,仅在运用不同理论研究不同领域。1940年12月,吴文藻即言,中国社会学教学与研究应重视不同学派的介绍,“中国今日思想界所需要的刺激,是学派之争,而不是门户之见”^④。不过,如果说民国社会学界有明显派别的话,仅孙文本等社会行为与文化论与潘光旦等优生论间的区隔较为明显。两派间的分歧正表明社会行为与文化分析渐居民国社会学理论的中心位置。

融会与创新

民国学界试图融会美国各家社会学理论,并力图有所理论创新。这一方面体现于基本理论的融会与创新,即基于融会美国理论,构建新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为将引入的美国理论及自己提出的诸多新创见应用于中国社会研究。融会美国社会行为分析与文化社会学理论为民国理论社会学一般趋向;民国学界在研究中国社会过程中亦力图有所理论创新。因民国社会学研究之繁,无论融会美国理论,还是理论创新,均非本文所能尽述。在此仅就其要者,略举数端,以对民国学界学术旨趣有所管窥。

孙本文等构建的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核心为美国社会行为分析与文化社会学理论的结合。就某种意义言,孙本文等构建的此种社会学理论具有相当创新性。1928年6月,孙本文在《社会学ABC》中即申明,他特别重视文化与态度,并试将两者统一于社会行为研究,“一切社会行为,不外乎文化与态度的交互作用”,因为态度即“准备的行为”,可以决

① 孙本文:《社会学原理》(上)(据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影印),《民国丛书》第2编(15),上海书店1990年版,第113~117页。

② 杨开道:《农村社会》,世界书局1930年1月初版,1931年12月4版,第9、2~3页。

③ 言心哲:《农村社会学概论》,中华书局1934年3月初版,1939年8月再版,第394~395页。

④ 吴文藻:《社会学丛刊总序》(1940年12月),费孝通译,Bronislaw Malinowski原著:《文化论》(What Is Culture),商务印书馆1944年7月重庆初版,1946年5月上海2版,1947年1月上海3版,第1~3页。

定行为的趋向,是行为的起点^①。1948年5月,他在《当代中国社会学》中提醒大家,不要把他误认为文化派或心理派学者,因为他认为社会现象中心理因素与文化因素同样重要^②。在孙本文看来,社会行为分析、文化社会学、人文区位学诸20世纪初美国新兴社会学理论完全可相辅相成而相互发明。1928年9月,他在《文化与社会》中指出,“此三派研究之方面不同,故其所得之结论亦各异。要之,一种完全之科学的社会学不能离此三种趋势。三者互相补助而互相发明者也。社会心理学派研究社会现象之心理(主观)方面;文化学派研究社会现象之客观方面(即社会环境方面);地位学派研究社会现象之地位关系方面。虽美国社会学家未必欲统合此三派而融会贯通之,但就目前趋势而言,社会心理学派与地位学派已有不可分离之关系,而此二者又渐渐注重于文化方面。此不但就理论上言必须联结,而事实上已经如此。譬于派克、蒲其斯二教授,系汤麦史社会心理学派之健将,近来竭力倡导人类地位学,并且亦时时讨论及于文化事实。于此亦可占其趋势矣”^③。应该说,孙本文对美国20年代社会学潮流此种观察确属敏锐。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社会行为分析与人文区位学理论间的关联自不必说,而该系用以分析社会行为的社会环境因素,确与美国文化社会学所言社会文化大体一致。孙本文于1927年1月在《社会学上之文化论》中介绍,汤麦史于1918年在《欧美波兰农民》(*The Polish Peasant in Europe and America*, Vol. 1, 1918)第1卷中所言社会价值(Social values),亦即人们所能感知到并据此调整个人行为的事物,如食物、器具、钱币、一首诗、一个大学、一种科学学说,“与人类学家之所谓文化无异。所以,谓氏之分析社会价值,即系分析文化,亦无不可”^④。吴景超于1929年8月在《都市社会学》中亦说明,芝加哥大学所谓“环境”指“广义”的环境,包括一个地区的风俗、信仰、习惯等方面^⑤。

在孙本文心目中,人们心理行为与社会文化在社会现象中有着明确定位,共同构成社会学研究对象的两大主体。他于1928年9月在《文化与社会》中称,文化是“物观的”,从社会客观环境方面制约社会现象;态度是“人观的”,从人的内在主观心理方面制约社会现象^⑥。他尤其强调社会文化环境对人们心理行为的制约作用。1935年1月,他在《社会学原理》中分析,人的行为由社会文化环境陶冶而成,“人的一举一动,是受社会上文化影响后得适当刺激引起的结果。……人的种种行为,是在社会上人与文化的环境中,渐渐学习而养成的”^⑦。如此,孙本文就将社会行为研究与文化研究结合起来,强调人的行为是处

① 孙本文:《社会学ABC》,世界书局1928年7月初版,1929年1月再版,《例言》(1928年6月)第1~2、50页。

② 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胜利出版公司1948年版,第241~243、246页。

③ 《美国社会学现状及其趋势》(《东方杂志》第23卷第12号),孙本文:《文化与社会》,东南书店1928年9月初版,1930年9月再版,第137~138页。

④ 孙本文:《社会学上之文化论》,朴社1927年版,第43~74页。

⑤ 吴景超:《都市社会学》(据世界书局1929年版影印),《民国丛书》第1编(15),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61页。

⑥ 《人类态度与文化》,孙本文:《文化与社会》,东南书店1928年9月初版,1930年9月再版,第19~20、26~27页。

⑦ 孙本文:《社会学原理》(下)(据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影印),《民国丛书》第2编(15),上海书店1990年版,第237~238页。

于各种文化环境之中的行为,研究人的行为必须结合其所处的文化环境。

孙本文有关社会文化问题的阐述虽多承乌格朋余绪,但由于他在关注社会文化研究的同时,亦关注芝加哥大学社会行为研究,所以,对乌格朋有关人类本性与文化关系之论点提出修正。因乌格朋于1922年出版《社会变迁》时,派克、蒲其斯《社会学导言》刚于1921年出版未久,而派克、蒲其斯1925年编辑出版的《都市》尚未问世,故乌格朋尚未注意将其文化社会学理论与芝加哥大学社会行为分析、人文区位学理论相结合问题。因而,乌格朋在论述人类心理行为与社会文化关系问题时,倾向以人的生物“本性”解释行为的心理基础,认为人类行为是人的本性与文化环境的混合物^①。1929年10月,孙本文在《社会变迁》自序中称,他“对于乌氏所论本性与文化关系诸点,颇不同意”^②。他认为,乌格朋所言“本性”应为后天养成的“个性”,“个性不是先天的,而是出生以后在社会上的文化环境里面渐渐地养成的”^③。孙本文对乌格朋论点的修正说明,在融会美国文化社会学与社会行为分析理论问题上,孙本文的认知比乌格朋更为深切。

在社会约制问题上,吴泽霖在1930年1月出版的《社会约制》中虽大体继承其师罗斯和伦姆雷的理论,但亦力图运用文化社会学、社会行为分析等美国新兴理论对罗斯和伦姆雷所论有所发展。罗斯于1901年出版《社会约制》时,美国文化社会学尚未兴起。吴泽霖则试图由文化社会学视角分析社会约制问题,认为社会约制是人类文化的核心内容,人类如果没有社会约制能力,“那非但不能做到‘万物之灵’,或将早被淘汰,形迹消灭,也是意中的事”。他同时认为,罗斯所言“Social control”仅指以上取下的“社会控制”,内涵过狭,而伦姆雷于1925年在《社会约制的工具》中所言人们相互间的约制较全面。因此,吴泽霖将“Social control”译为“社会约制”而非“社会控制”。吴泽霖又结合汤麦史有关社会行为分析理论,辨明社会约制的工具与方法之别。他认为,伦姆雷有将约制的工具与方法相混淆之嫌。他认为,工具是一种可以利用的东西,其性质是静的;方法是一种行动的过程,其性质是动的。伦姆雷所言理喻、恐吓等社会约制的工具,应为社会约制的方法。他提出,社会约制就是约制人们的行为,而行为属于心理现象,故应从心理方面认知社会约制的工具。汤麦史所言保守心(Security)、好新心(New experience)、求显心(Recognition)、社交心(Response)是人们行为的原动力,应为社会约制的基本工具^④。

民国时期农村社会学与都市社会学理论体系虽脱胎于美国,但中国学者在引进美国论述构架的同时亦不乏修正与补充。杨开道在1929年版的《农村社会学》中,对吉勒特《农村社会学》、何桑《农村生活的社会学》、戴洛《农村社会学》等书有关农村社会学研究领域的论述提出修正。他认为,这些论著视农村社会学为应用学科,将农村经济、农村教育、农村宗教、农村卫生、农村生活社会化等农村社会问题作为农村社会学研究重点,多未厘清

① 孙本文:《社会学上之文化论》,朴社1927年版,第64、60页。

② 孙本文:《序》(1929年8月5日),孙本文:《社会变迁》(孙本文主编《社会学大纲》第9种),世界书局1931年版,第1~4页。

③ 孙本文:《社会变迁》(孙本文主编《社会学大纲》第9种),世界书局1931年版,第121~127页。

④ 吴泽霖:《社会约制》(孙本文主编《社会学大纲》第11种),世界书局1931年版,《自序》(1930年1月)第1~2、1~2、29~30、30~43页。

农村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作为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农村社会学主要是“纯粹社会学”(理论社会学),其研究领域应为农村基本“社会现象”,亦即农村生活的全体或基本。以研究农村社会问题为目的的“应用农村社会学”虽可纳入“广义的农村社会学”范畴,但究属次要部分^①。邱致中虽然同意安迪生、林德门在《都市社会学》中将都市社会学研究对象确定为整体都市社会而非都市社区,但亦指出其理论不足。他认为,安迪生和林德门仅以欧美现代典型都市社会为对象,并过于强调研究社会问题和社会组织,不仅未顾及近代以前的都市社会史和当代其他形式的都市社会,亦未深入研究都市社会本质,虽“已达到都市社会学的大堂,但还未能入室”。他设想,都市社会学是“研究都市社会底起源、分类、历史、环境、构造、问题、政策及未来预想底科学”^②。由此,邱致中大大扩展了都市社会学研究领域。

民国学界在修正、补充或发展美国社会学理论进而构建自身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同时,又致力于将美国诸社会学理论应用于中国社会研究,并力图在此过程中有所理论创新。燕京大学师生开展的中国现代社区研究甚至在同时期世界社会学研究中亦占据一席之地。其核心理念即将英国功能派文化人类学文化分析方法整合于美国现代社区研究范式之中。其实,无论推崇英国功能派文化人类学理论的燕京大学师生,还是孙本文等理论社会学家,对于英国功能派人类学与美国社会学理论,甚少此疆彼界的派别意识。孙本文便对费孝通译马林诺斯基《文化论》及此书所附吴文藻撰《论文化表格》评价颇高,认为“此书在文化各方面均有详明的阐释,而吴氏讨论文化表格,尤为精彩”^③。1933年派克在燕大的讲学基本奠定了该校师生社区理念的基础。1935年,吴文藻在《西方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一文中即认为,芝加哥大学都市调查是“科学的社区研究之开端”^④。实际上,燕大师生对芝加哥大学都市社区调查方法与英国功能派文化人类学理论是并重的。该校社会学系教授赵承信即提出中国社区研究须并用两种理论与方法。他于1936年分析,英国功能派人类学强调运用比较法(Comparative method),一方面比较各个社区之间整个文化体系的异同,另一方面考察个别文物制度在整体社区的功能和结构。这种比较法完全可以应用于边疆非汉族部落社区(Tribal community)、汉族村落社区、市镇社区、县城或省会社区、近代都市社区等中国各类社区研究。芝加哥大学人文区位学方法同样可应用于中国城市、市镇、农村等各类社区研究。例如,“从人文区位学的观点去研究新旧北平区位形态,必然发见许多很有兴味的事实及理论来”;若能以此种方法考察中国某些较大的市镇,“对于中国内地社区经济组织必多有了解”;亦可运用人文区位学方法研究中国农村社区家族与宗族问题^⑤。

① 杨开道:《农村社会学》,世界书局1929年8月初版,第1~7页。

② 邱致中:《都市社会学原理》(都市社会学丛书第二种),上海有志书屋1934年版,第267~269页。

③ 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胜利出版公司1948年版,第203~204页。

④ 《西方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1935年),《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151~158页。

⑤ 赵承信:《社区研究的区位法与功能法》(1936年),《社会科学概论选读》,燕京大学法学院1938年版,第593~608页。

吴景超归国之初,虽着力引介芝加哥大学都市社区研究方法,但之后把研究视角转向中国都市工业发展问题,成为30年代研究中国工业化问题的领军者^①。故孙本文将其归入注重经济因素的社会学家之列^②。其理论渊源即为对芝加哥大学都市社区研究理论与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格莱斯(N S B Gras)都市经济理论之融会。他阐释的“都市区域”概念即为融会格莱斯都市与周边“附庸”地区关系理论与蒲其斯关于都市区域布局理论的结果。格莱斯任明尼苏达大学教授期间于1922年出版的《经济史入门》(*An Introduction to Economic History*, 1922)集中阐述都市与周边“附庸”的关系,认为都市的特征在于工业、金融业、批发业发达,各类专门人才集中,且交通便利,其周边方圆数百里以农业为主的地区成为其“附庸”区域^③。蒲其斯则提出,由都市中心到外围依次形成中心商业区、商业区与居住区过渡地带、中等住宅区域、高等住宅区域、郊外工业区的“五道圈”理论。吴景超在《都市社会学》中综合格莱斯、蒲其斯两种理论认为,“都市区域”由“都市”与“附庸”两部分组成,“都市”与“附庸”通过商业贸易、工业原料与产品交换相联系。一个发达的都市不仅要有商业与金融机构、便利的交通与通讯设施,而且郊外要有工业区,以便将收集来的原料加工为工业品^④。

孙本文特别注重研究中国现代文化区域。他认为,分析文化区域是研究不同地域社会行为异同的重要手段。1929年8月,他在《社会的文化基础》中即称,“个人的行为的方式是一种特殊文化区域的产物”,生活于某一文化区域的人们行为往往受此区域特定文化的支配,“我们所以要分析文化特质和区别文化区域的根本目标,可说就在要了解人民的行为和推测人民的行为”^⑤。他曾于1927年10月尝试分析江苏、浙江两省的文化区域,认为江苏长江以南地区与浙江仙霞岭以北地区属同一文化区域,语言风俗相近;江苏长江以北地区在文化上与山东相近;浙江仙霞岭以南地区文化近于福建。他申明,此论“仅系一种粗浅的观察,固不足以言何种科学的价值,但为提倡研究起见,亦足以使研究文化者,知我国文化区域,确有分析之可能”^⑥。他在《社会的文化基础》中专门提出中国文化区域研究的大致设想,强调“要研究中国文化区域,必须从分析全国文化特质下手”,事先拟定详细的调查提纲和计划,再具体进行文化调查,将各地文化特质分类记述,分析其异同,制成文化特质分布地图,最终划定全国的文化区域^⑦。

杨开道运用美国农村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国农村社会亦不乏创见。他以美国农村生活运

① 吴景超将30年代所撰有关中国工业化论文辑为《第四种国家的出路》一书,1937年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② 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胜利出版公司1948年版,第254页。

③ 吴景超:《社会组织》(孙本文主编《社会学大纲》第7种),世界书局1931年版,第47~55页。

④ 吴景超:《都市社会学》(据世界书局1929年版影印),《民国丛书》第1编(15),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1~7、28、47~49页。

⑤ 孙本文:《社会的文化基础》,世界书局1929年版,1932年9月3版,第96~98页。

⑥ 《中国文化区域之研究》(1927年10月10日),孙本文:《文化与社会》,东南书店1928年9月初版,1930年9月再版,第31~36页。

⑦ 孙本文:《社会的文化基础》,世界书局1929年8月初版,1932年9月3版,第93~95页。

动(Country life movement)为蓝本,阐述“现代农村社会(社区)”概念^①。20世纪初美国农业调查专家白勒、密歇根州立学院教授白德菲、先后任职于威斯康星大学和美国农业部的葛尔宾倡导开展农村生活运动。他们认为,要解决农村问题,不仅应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改善农业生产的组织与管理,还须以社会学手段改善农村生活。杨开道积极主张将此种运动引入中国,认为须制定中国开展农村生活运动的整体计划。他进而提出建设中国现代农村社区设想,包括以下具体措施:发展教育,增加农民知识;发展农业科学,改良农事;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业经济管理;发展农村交通,增进农民间的交流;增强各村内部的分工、合作与团结;建立健全各级农民组织;培养农村管理、农业技术等方面的农村领袖;发展社会服务,提高农民的社会服务精神;生活社会化^②。杨开道亦试图将美国文化社会学理念应用于中国农村社区研究。1930年1月,他在《农村社会》中表示,“农村里面虽然有共同地域、共同血系(指家族社会的农村),同时,也有共同的文化(Common culture)。”他认为,农业是农村社区最重要的文化,对农村的生产、生活、思想观念、家庭组织等各方面具有深刻影响。此外,农村文化还包括共同语言、社会习俗、教育、宗教等精神文化,以及道路、建筑物、纪念物、坟地等物质文化^③。

如上所言,民国学界对美国各种社会学理论具有较强的融会贯通意识,在引入美国各家理论之时,又试图沟通美国各家理论,淡化其异。融会与沟通之结果,自多创见。孙本文融会美国文化社会学与社会行为分析理论,构建出以社会行为为对象、以社会文化分析为基础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不仅为民国社会学理论体系之标杆,即相较美国社会学理论亦不乏创新价值。尤其孙本文结合社会行为分析理论对乌格朋有关人类本性与社会文化关系论点的修正,颇具学术突破性。燕京大学师生整合美国现代社区理念与英国功能派文化人类学,学术意义亦极深远,几成民国社区研究之圭臬。此外,吴景超综合芝加哥大学人文区位学理论与格来斯都市经济发展理论对都市工业的阐发,杨开道、邱致中等分别对美国农村社会学、都市社会学理论的补充或修正,均表明民国学界在引介美国社会学理论时的创新意识。与美国社会学理论相较,民国学界的学术创新虽为新芽,但在中国社会学史,其流风余韵,价值自呈。

社会学理论之传入中国,先由严复援自英国,清末民初一度以由日本引入为主。自20年代始,随着孙本文、吴文藻、杨开道、吴景超、吴泽霖、潘光旦等留美生回国,自美国引入之社会学理论遂成主流。这些留美学者极具求新意识,所引介者皆为美国当下最新社会学理论。20年代亦为美国社会学研究之重要转型期。随着注重分析人们内在心理的早期心理派社会学日渐式微,结合社会环境分析人们外在行为的社会行为分析理论、借

① 1940年2月,杨开道在与周宪文争论中国能否以农立国问题时,又以“现代农村社会(社区)”为基础,阐释“现代农业国家”概念。他认为,中国应从“中古农业国家”变成“现代农业国家”。中国应实现农业科学化和机械化,以农产品外销为重点,同时,中国工业化须有限度,只以自给自足为目的,不能像英国、日本等国家那样从国外输入工业原料,输出工业产品。(参见杨开道:《现代农业国家诠释——中国民族前途预测》(《时事新报·农业周刊》第12期),周宪文编:《中国不能以农立国论争》,中华书局1941年版,第91~97页。)

② 杨开道:《农村社会学》,世界书局1929年版,第84~96页。

③ 杨开道:《农村社会》,世界书局1930年1月初版,1931年12月4版,第70~78页。

鉴文化人类学方法考察社会文化的文化社会学、结合地理区位分析社会行为的人文区位学等新兴社会学理论在美国日渐发达。其中，芝加哥大学尤为社会行为分析与人文区位学之重镇，哥伦比亚大学则为文化社会学研究中枢。两校社会学研究观念与方法对民国学界影响至巨。而且，20年代亦为美国以农村、都市社区研究为基础的农村社会学与都市社会学之重要形成时期，其研究范式亦很快为中国学界所引进与吸收，两门学科在中国亦始酝酿。由此而言，20年代以降，中国社会学研究在时间上几与美国同步。尤其是，民国学界试图将美国各家理论融于一炉，由此构建起的社会学理论体系确具有一定创新性。实际上，美国20世纪初形成的社会行为分析、文化社会学、人文区位学等理论，与欧洲哲理式的社会学相较，颇具社会实证色彩。民国社会学承其余绪，其利与弊，远非本文所能评说。

(阎书钦：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